



梁钊韬先生生平

梁钊韬(1916年—1987年),字勉之,广东顺德杏坛人,是近代中国杰出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作为中国当代人类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在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其学术范式影响至今。

1935年,梁钊韬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师从林惠祥和郑德坤,1937年转入中山大学历史系。1939年获学士学位并考入中山大学研究院,师从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杨成志。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中山大学奉命西迁,梁钊韬等随杨成志取道桂林入滇。1940年8月,中山大学迁回广东韶关乐昌。1941年6月,梁钊韬参加杨成志组织的粤北乳源调查,并负责瑶人民间信仰部分,同年获得硕士学位、毕业,留在中山大学任教。

新中国成立后,梁钊韬积极响应号召,参加了中央及地方组织的中南民族访问团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深入广东、广西等地的少数民族地区(如海南黎族、苗族及粤北瑶族地区),为国家的民族识别和民族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后,中大人类学系被取消,梁钊韬转入历史系,并主持新设立的考古学教研室。他将人类学、民族学与考古学有机结合,在华南新石器时代及百越文化研究中取得丰硕成果。

1958年,在广东省曲江县马坝乡狮子岩,当地农民起坳泥时发现了一具古人头骨化石。时任中山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的梁钊韬随即带队赶赴现场,协助进行了科学的清理与发掘。这具后来被命名为“马坝人”的早期智人化石,填补了中国古人类进化史上的重要空白。

改革开放后,中国学术界迎来春天。梁钊韬敏锐地意识到复办人类学对国家社会发展和学术复兴的迫切性。他四处奔走、大声疾呼,向教育部和中大校方建言。1981年,教育部正式批准中山大学复办人类学系。这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复办的第一个人类学系,梁钊韬出任首任系主任。

梁钊韬主张并实践了将“体质人类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语言人类学”融为一体的“四科架构”办学模式,并强调必须结合中国国情、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研究,奠定了中大人类学在中国乃至国际上的独特学术地位,还积极推动中国人类学走向世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获得全国首批人类学博士学位授予权,梁钊韬被聘为我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生导师,晚年的他亲自培养了包括中国第一批人类学博士在内的众多优秀高级学术人才。在临终前的病榻上,他依然萦怀于学系的发展、教材的编写以及研究生的论文。

1987年12月2日,梁钊韬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71岁。



梁钊韬先生(前排中)与中大人类学系教职工在一起

# 脚踏田野寻真知 杏坛韬略兴绝学

纪念梁钊韬先生诞辰110周年



梁钊韬是中国现代人类学重建与自主发展的关键奠基人,其一生的学术轨迹与中国人类学萌芽、停滞、复兴的百年历程高度重合。身处二十世纪学术动荡与学科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他坚守“田野就是课堂”的核心理念,突破西方单一学术范式的局限,开创中国多民族社会现实,探索本土化的人类学研究路径,开创了中国人人类学自主发展的先河。

## 跨学科方法论的形成与核心构成

构建“考古学—民族学双核”跨学科研究体系,是梁钊韬对中国人类学最核心的方法论创新。该方法论植根于其多年西南、华南少数民族田野实践,同时批判性吸收博厄斯历史特殊论、马林诺夫斯基功能主义等西方经典理论,依托中国本土族群与文化材料完成理论再造。

该方法论形成了层层递进、逻辑闭环的理论体系与可落地的操作范式。理论层面,建立“材料搜集—多维分析—系统阐释”的完整研究路径,统筹整合考古挖掘、民族调研、文献考据三类核心素材,兼顾历时性的历史演变脉络与其时



在我的书柜深处,珍藏着一叠泛黄的信札。十一封信,8391字,跨越两年零一个月。六封毛笔小楷,字字端庄如人品;五封钢笔手书,笔笔恳切见真情。

写信人是我攻读博士时的导师、中国人人类学复办的开创者梁钊韬教授。收信人,是当年那个从青藏高原来的藏族青年——后来被称作“新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和藏族博士”的我。

今年是先生诞辰110周年。灯下重读这些信件,那段师生情缘的点点滴滴,如高原的星空般清晰而璀璨。

## 从愣头青到开山弟子

1983年,我负笈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成为新中国复办人类学后招收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第一次见导师,梁先生就为我确定了研究方向——民族考古。

先生所倡导的“民族考古学”方法论,强调多学科融合。1986年2月5日的信中,他明确写道:“……民族学与考古学相结合,本来就是文化人类学的组成部分。”这便是先生的“道”。

最让我铭记的,是他传授“道”的方

## 梁钊韬先生对中大历史学科贡献斐然

□刘志伟



梁钊韬先生在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任教将近30年,为中山大学历史学学科建设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1974年进入中山大学历史系,从李松生老师那里第一次听到梁先生的名字和民族学、考古学概念。梁先生及其培养出来的民族考古学的老师们的学术领域,是我最早接受学术启蒙的园地。

梁先生在历史系期间,提出要考考古学、民族学、历史文献学互相印证,互相

性的当下文化形态。

操作层面,梁钊韬创立的“三重证据互证”机制与定量定性结合模式,成为中国民族考古学的核心研究范式。他主张田野调研需同步采集体质、语言、物质、社会等多维数据,构建立体化研究矩阵;通过考古类型学界定文化时序,依托民族志解读文化功能,借助历史文献佐证文化内涵。这一成熟方法论在其学生陈明芳的悬棺葬研究中得到完整落地,成为学界经典研究范例。

## 学科重建的历程与核心贡献

1981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复办,标志着中国人人类学正式回归制度化、规范化发展轨道。梁钊韬提出的本土化四分变体架构,让中山大学迅速成为全国人类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核心阵地。在学科复苏的关键期,他深耕教材建设,1985年牵头合著《中国民族学概论》,融合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与西方功能理论,以黎族制陶、彝族家支制度等本土案例阐释文化变迁与社会发展规律,成为学科复苏的标志性教材。同时,他主持翻译多部国外学术

## 十一封手札,一段跨越时空的师生情

□格勒

在信中详细论述苗族族源与屈家岭文化的关联后,他特地嘱咐:“自行考虑处理,不可强随余见。”不是灌输,而是启迪;不是强从,而是引导。

他曾经措辞平淡地说:“有什么问题,找我。没问题就不找。”这正是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现代回响。

## 从“矛盾重重”到紧紧拥抱

1985年至1987年间,我多次深入青藏高原进行田野调查,前后长达16个月。我们将近一年的时间没有见面,全靠书信往来。我在成都写博士论文,写完一章便寄去一章。先生收到后常常迅速回信,字里行间满是关切。

先生不仅在学术上悉心指导,更为我的职业发展百计筹划。他曾向学校争取我留校任教,希望我成为他的“接班人”。然而,恰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在北京成立,中央统战部来调人。先生在1986年4月2日的信中写道:“今党中央决定在京成立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我当顾全大局,服从中央对您毕业后的任用。”

数日后,他又在信中吐露心声:“在我

著作,搭建起中外人类学对话的参考体系。

人才培养是梁钊韬学科重建的核心抓手。1983年,他招收新中国首位人类学博士生格勒,指导学生扎根藏区田野,同步采集考古遗存、口述史料与宗教仪式资料,产出的博士论文成为民族考古学典范成果。

梁钊韬的学科重建是学术范式的系统性革新。其创立的民族考古学方法,打通考古学与民族学的学科壁垒,为三星堆、良渚等史前文明研究提供全新阐释路径。1984年,他主办国际人类学研讨会,在对外开放交流中坚守学术自主,着力构建以中国本土问题为核心的学术话语体系,学术成果辐射全国,推动厦门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重启人类学专业。

## 从巫术研究到中国学术话语构建

梁钊韬的理论创新贯穿整个学术生涯,实现了从单一巫术研究到中国本土人类学话语体系的完整建构。其早期巫术研

究突破西方“巫术—宗教”二元对立框架,提出“巫术宗教”复合形态,结合商周青铜器纹饰、楚地帛画等本土遗存,阐释中国巫术兼具通灵祭祀与政治礼制的双重属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其理论体系日趋系统,成熟。在原始社会史研究中,他依托仰韶、龙山文化及华南新石器时代遗址材料,修正摩尔根社会进化论与恩格斯国家起源学说的固有局限,提出中国史前文明“和平演进”的独特模式。1983年提出的“民族考古学”理论是其核心创新,构建“考古遗存+活态民族志+历史文献”的古今互证模式,证实华南史前技术的活态传承脉络。

此外,其百越文化研究、文化动态平衡理论进一步完善了本土学术体系。他系统论证百越族群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贡献,奠定“百越学”研究基础;创新性以传统“气论”解读巫术文化;提出“文化动态平衡”理念,为当代民族文化治理、文化现代化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其系列原创性成果,为中国人人类学实现学术自主、服务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坚实理论滋养。

(作者系中山大学教授、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原党委书记、人类学系原系主任)

究突破西方“巫术—宗教”二元对立框架,提出“巫术宗教”复合形态,结合商周青铜器纹饰、楚地帛画等本土遗存,阐释中国巫术兼具通灵祭祀与政治礼制的双重属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其理论体系日趋系统,成熟。在原始社会史研究中,他依托仰韶、龙山文化及华南新石器时代遗址材料,修正摩尔根社会进化论与恩格斯国家起源学说的固有局限,提出中国史前文明“和平演进”的独特模式。1983年提出的“民族考古学”理论是其核心创新,构建“考古遗存+活态民族志+历史文献”的古今互证模式,证实华南史前技术的活态传承脉络。

此外,其百越文化研究、文化动态平衡理论进一步完善了本土学术体系。他系统论证百越族群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贡献,奠定“百越学”研究基础;创新性以传统“气论”解读巫术文化;提出“文化动态平衡”理念,为当代民族文化治理、文化现代化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其系列原创性成果,为中国人人类学实现学术自主、服务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坚实理论滋养。

(作者系中山大学教授、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原党委书记、人类学系原系主任)

的“当今唯一以青藏高原文化为依据的人类学著作”。我先后应邀前往美、英、法、日等10多个国家讲学,在国际藏学界为祖国发声。1991年,我被授予“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称号;2005年,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殊荣。

但我知道,这一切的起点,是中山大学,是梁钊韬先生。没有他,我或许永远是那个从“世界屋脊”走来的懵懂青年。

从受业弟子到授业恩师

如今,我也成为博士生导师,指导了30多位博士研究生。一如当年先生培养我那样,我鼓励他们继续在继承中创新,在尊重中超越。先生曾在信中叮嘱我:“树立自己的应有尊严和威信。”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也传递给一代又一代学子。

三十八年过去了。每当我坐在书桌前,面对那些求学的年轻人,我总会想起先生伏案写信的身影——毛笔小楷,一字一句,工工整整。那是一个学者对学术的虔诚,一位师者对弟子的深情。

(作者系新中国首位人类学博士、首位藏族博士,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原副总干事)

## 赓续人类学学科 突出中华民族共性研究

□麻国庆



我于1986年考入中大人类学系,进校那半年,经常能看到梁先生到马丁堂来和大家交流,参加相关讲座。1986年底梁先生病重住院,我们研究生轮流陪护,和先生有单独十几个小时的相处,先生给我讲了复办人类学的过程,场景今天还历历在目。之后不久,梁先生就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一生热爱的人类学学科。

我觉得梁先生的贡献已经超出了他当时所处的时代。先生一直强调学科与问题之间的关系,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强调人类学、民族学要为边疆地区不同群体的发展服务。他还特别强调中华民族的共性特点。他的学术论断,对于今天的交叉学科建设、突出问题性学术和学科性学术的关系,理解中华文明的五个特性、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以及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都有着积极的学理意义。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原系主任)

## 梁钊韬先生的博物馆观

□肖海明



以前我们对梁先生在博物馆方面的贡献谈得较少,其实梁先生曾在博物馆工作过两年多时间。1944年,梁先生到成都华西大学博物馆任职,返回中大后创办了中山大学人类学博物馆。

我在中大读书时无缘面见梁先生求教有关博物馆的问题。他留下来的唯一一篇有关博物馆的文章,上世纪四十年代发表的《略述博物馆的历史和任务》,具有重要价值。他指出,“现代的博物馆……它所负社会上或民族上的教育使命是非常重大的”“博物馆可以促进人类学进步,而人类学却可以发扬博物馆的功用”“在我国目前的教育制度中,博物馆教育还没有注意到”。这里可以欣慰地告诉梁先生,至今年5月18日,中国备案博物馆的数量已发展到7188家。

从梁先生的经历以及上文所举观点来看,梁钊韬先生也应该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博物馆学家。

(作者系广东省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

## 重走梁钊韬先生的滇西民族调查之路

□田阡



从2024年夏天起,我带着团队一次次走进滇西,去的是梁钊韬先生六十年前调查过的村子。站在那些村子之间,看着脚下刀劈一样的山路,我每天都在想,他到底是怎么去的。这不是一个关于“多不容易”的感叹,是关于“为什么一定要去”的问题。村子总会变,公路总会通,文化总会流动。那追踪研究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想了很久,觉得意义在于“去”这个动作本身。自己的土地,得自己走一遍、自己记一遍,用自己的脚走,自己的眼睛看。

六十年,路变了,村子变了,文化变了又没全变。可那个“一定要去”,从来没有变过。在梁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今天,这条路上的人还会继续走下去。

(作者系云南民族大学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研究院执行院长、西南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教授)

## 他用一生推动中国人人类学本土化科学化

□杨小柳



梁钊韬先生一生致力于在西南边疆开展民族调查与研究,深度剖析呈现了中华文明早期南方地区“多元一体”进程发生发展的机制,证实了从新石器时代起,百越民族就不断与中原华夏族融合混血,为缔造中华民族作出了伟大贡献。他还敏锐地发现沿海族群在多元一体的进程中发挥独特的联通作用,创造性提出从海陆互动的角度理解中华民族的研究路径。

建立属于中国自己的人类学是梁先生一生的学术报国志向。他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田野材料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立原创性理论,提倡民族学、考古学、历史学等跨学科综合研究。他的一生,是推动中国人人类学本土化、科学化的生动写照。

(作者系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

## 梁先生与中国人类学的西南知识系谱

□李锦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梁钊韬先生在厦门大学学习期间,曾受教于考古学家郑德坤。1941年,郑德坤接任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一职。1943年,时任中山大学社会学系讲师的梁钊韬在与郑先生的通信中表示,深感“西北川康一带,方为边疆学术研究之较好对象”,在对方的支持下前往华大。

1944年到任后,梁钊韬担任博物馆民族学部主任,专门从事西南民族历史与现状的研究,汇编《西南民族志资料书》与《西南民族丛书》以作“我国历年民族志之总检讨”,总字数达300余万。1945年,二人在《华西大学博物馆丛刊》上发表了《中国西南民族导论》,首次对中国西南的民族进行了系统介绍。其中,按照总论绘制的“西南民族分布图”,建立了现代人类学的西南民族分类体系,是中国人人类学西南知识系谱的奠基之作。

(作者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